

王捷南 著
武汉出版社

有没有搞错

——一个记者的所见所闻

人物专访

访谈录

十四大采访手记

茶馆闲聊



王捷南，山东莱阳人。1950年8月8日生于青岛市。后随父母到上海，小学、中学均在上海就读。高一未读完，遇上“文革”，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当了兵团战士。又遇“恢复高考”，入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后进文汇报社，1982年至1995年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从事采访工作，任记者，又任主任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此书仅为作者在北京采访中所见所闻的一小部分。

序

范敬宣

“最想做的事情往往最后做成。”——记不清这是哪国的谚语了，反正我为王捷南的书写“序”，足足拖了半年之久，倒很可以拿这句谚语来做“挡箭牌”。

去年十月二十日，我收到捷南来信和一套书稿，说是武汉出版社要为他出一本集子，希望我能写个“序”。对于年轻人的这类要求，我向来近乎“有求必应”的，一来是对自己的文字从不怎么看重，一来是年轻人的要求并不高，“能写几百字就可以”。既然如此，为什么对捷南的书稿拖得那么久，急得他不下十次来电话催稿呢？这里有个很值得一说的原因。

我认识捷南已有 10 年以上的历史。平时交往不多，只是开会时偶然见上一面，谈上几句。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勤奋、谦虚、认真的青年，有点书生气，但不是书呆子气。活动能力很强，有些重要活动，一般记者进不去，他总能想法挤进去。因此我经常向自己报社的记者夸奖他的能力。不过，对于捷南的新闻作品，我过去看得不够多，因为没有想到有一天会

为他的作品集写“序”，所以没有作系统研究。这是实话。这回为了完成他的嘱托，认认真真地把这份书稿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确实有点惊讶，用京剧界的行话来说，真想不到他的“戏路子”这么宽！

这本集子共分“访谈录”“北京书简”“茶馆闲聊”“十四大采访手记”“京华趣谈”“人物专访”及“四合院”七个栏目。这些栏目里的文章，论内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学术……广泛涉猎；论采访对象，政府官员、专家教授、作家演员、沙场老将……各有特色；论表现形式，既有洋洋数千言的论文，又有短短几百字的杂侃；既有庄重的宏论警言，又有轻松的闲聊趣谈。更可贵的是，谈经济则俨然一学者，谈艺术则宛然一专家，内行看了不觉肤浅，外行看了不嫌艰深，真可谓“文武昆乱不挡”。对新闻记者来说，这是难得的材料。

这就又涉及一个老话题：新闻工作者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邓拓同志讲是“杂家”。我一直赞同这个看法。所谓杂，其实就是广，包括广博的知识，广泛的涉猎，广阔的眼界。广的对立面是窄，窄是新闻工作者的大忌。现在有不少新闻工作者窄得很，涉猎的领域窄，知识面窄，见识窄，眼界窄，思路文路也窄。这种状况恐怕与我国新闻单位分工过细的体制有关。搞经济报道的和文化艺术不搭界，搞科技教育的又与政法社会不相干，甚至搞经济报道的中间又有许多分工，有管农业的，有管财贸的，有管工业的，而管工

业的中间又分出机械、电子、能源、化工、轻纺等等，各自划地为牢，互不侵犯。而分工越细，则视野越窄，视野越窄，则敏感越弱。追根溯源，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新闻工作上的反映，是不符合新闻规律的。按照这种方法，是培养不出“大家”来的。不久前，有一位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对我说，你们报社某记者，在他分工的专业上可以说是真正的内行，可是最近请他写一篇关于精神文明的报道，却把他难住了，最后写出来的和他的专业性报道相比，反差太大。这件事情说明，新闻记者的“戏路子”太窄，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形势了。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觉得捷南所走的路子是正确的，很值得广大新闻工作者注意。

目 录

序	(1)
---------	-----

访谈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吴敬琏教授访谈录	(1)
------------------	-----

北京书简

全民讨论《企业法（草案）》反响热烈	(18)
今年抓教育将有大动作	(24)
我高技术研究多层次展开	(26)
悼耀邦之英灵 成未竟之事业	(28)
你心里有人民 人民心里就有你	
——首都群众十里长街送耀邦	(30)
从洋浦到马利克工业区	(32)
巩固治理成果 加大改革份量	(34)
成功的实业家 出色的政治家	
——记者眼中的荣毅仁代表	(37)
建立市场经济合理运作基本框架	(39)

抓住契机加快培育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3)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解决金融混乱问题	(46)
让经济领域该热的热起来	(50)
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改革	(54)
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开放进程 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	(57)
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途径 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微观基础	(61)
今后改革面临正面突破 出台措施将注重规范化	(65)

茶馆闲聊

古都遗韵犹可忆 京华新曲更堪吟	(70)
说“侃”	(72)
不妨学学这种“活法儿”	(74)
去掉一点名人意识	(76)
说“赶潮”	(79)
姓什么?	(81)
北京人——“无可奉告”	(84)
文化人何不“经济经济”	(86)
双重“困扰”与选择的自由	(89)
北京该出“巨贾”了	(91)
官员与经商	(93)
京城男子汉	(95)
京城女人们	(99)

北京人仍然无可奉告·····	(102)
“机遇”乎? ·····	(105)
“后现代”瞎扯 ·····	(108)
关于老纳的话题·····	(109)
如何“消”得“费”合适·····	(111)
说不清的事儿·····	(113)
北京还有多少京味儿? ·····	(115)

十四大采访手记

十四大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18)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21)
关键是人才的竞争·····	(124)
展现社会主义强国之路·····	(126)
“法宝”在手 扬帆远航 ·····	(129)
思想大解放才能带来大变化·····	(131)
小平,您好!. ·····	(133)
七常委会见中外记者·····	(137)

京华趣谈

电梯的故事·····	(139)
北京小吃的神秘魅力·····	(141)
京城处处闻啼鸟·····	(143)
洋饮食业在北京·····	(145)

“OK，北京的自行车”	(148)
京城胡同赛鹅毛 饱经沧桑故事多	(150)
到龙潭庙会去	(153)
《编辑部的故事》拴住北京人的心	(155)
素描京城洋学子	(157)
“广老冒”入侵京城的启示	(160)

人物专访

把对美的追求融入绘画之中

——访香港英籍青年女画家史泊蒂

于细微中见功夫

——访微雕艺术家杨大可

惟愿孩子不断追求、前进

——“六一”前夕冰心老人寄语小读者

她是“煤矿的女儿”

——访日本女歌手牧村三枝子

访革命老人路易·艾黎

燃烧着的回忆

——访刘松林、邵华同志

“他终生奋斗不息……”

——访任弼时同志夫人陈琼英

写意又抒情

——访香港著名摄影艺术家陈复礼

愿终身为残疾人服务

——访邓朴方·····	(186)
“中国在变化，认不出来了”	
——加籍华人女作家陈若曦谈访华观感·····	(188)
身在太空时 难忘故园情	
——访美籍华人科学家、宇航员王贻骏博士·····	(190)
在燃烧着抗日烽火的大地上	
——杨成武将军满怀激情话当年·····	(193)
让美国人了解中国	
——访美国“看东方”节目主持人新羽西·····	(198)
一片深情 凝聚笔端	
——访《周恩来传略》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201)
“我们都想了解中国”	
——访北京国际协会主席魏德女士·····	(203)
深深的怀念	
——访罗瑞卿同志夫人郝治平·····	(206)
用艺术祈祷人类和平	
——访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	(209)

四合院

北京人神“侃”奥运·····	(212)
何必小家子气·····	(213)
“东方风来”·····	(214)
“银牌金罐奖”·····	(216)
烽烟散尽话教头·····	(217)

八方风雨会京师.....	(218)
星星不能老是那颗星星.....	(219)
“磕”串味了	(220)
关起门来不跌份.....	(222)
大牌小牌都要“和”	(223)
这世界变化快.....	(224)
“生旦净末丑”	(226)
有没有搞错.....	(227)
架他一把好秧子.....	(229)
看谁“八运”发.....	(230)

访谈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吴敬琏教授访谈录

敬琏同志是一位在理论上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近十多年里，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战略和政策方面，发表了许多独到的、并被实践验证了是正确的见解。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敬琏同志和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起，为冲破将计划和市场当作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标准的“左”倾思想的束缚作了不懈的努力。敬琏同志在这一场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的讨论中，作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贡献。

——薛暮桥

吴敬琏，现年62岁，著名经济学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素以直言不讳著称。以下是他于近日单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访谈录。

记者：吴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对于我国经济改革的取向问题，经过多年的讨论，多数经济学家早已达成共识，概括为“市场取向”的改革。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经济不能不以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因此，经济改革要以“市场取向”乃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近几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又出现了反复。有鉴于此，对这个“老问题”现在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中，您一直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并由此被称为“吴市场”。现在，想请您就此谈些意见。

吴敬琏：你的问题提得很对，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论争的焦点。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十多年来，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重大的发展，同时理论界也发生过多次反复。为了有助于将问题说清楚，我想先把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回顾一下，你看这样谈可以吗？

记者：可以。

吴敬琏：问题的最早提出，是在1978年7—9月，当时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问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会上提出的说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理论界在嗣后的讨论中，多数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如“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准确。1980

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了以下说法：“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一说法受到经济学家普遍赞成，理论界当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飞跃”。

记者：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开端是很好的。

吴敬琏：是的。但随后就出现了反复。1981年4月以后，报刊上有一系列文章批评1979年—1981年期间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宏观计划、微观市场”等观点。这些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有计划商品经济论”的理由是：“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则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重要体现”，“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文章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也不正确，因为这一提法的“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被抽掉了。”并且认为，这些主张“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不相容的”，因为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把国营企业改变为完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确认“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不是

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而是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行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文章还认为，按照“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的主张，“宏观就很可能被架空，成为‘梁上君子’”，结果就会“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把所有企业都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的观点，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观点还认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决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随后，十二大报告的有关提法改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此后，不同的提法基本上从报刊上消失。

记者：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争论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看来，争论确实很激烈，那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主张的批评，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

吴敬琏：一直延续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这年的7月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位研究人员撰写并在一些老

同志中分发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论文中，批评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认识”，认为应当重新肯定前此被否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这篇文章，得到一些老同志的称赞。随后，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批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9月9日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同意以下意见：“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同时，一批经济学家也向党中央提出，应当恢复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小组同理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磋商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样，就确立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对这一《决定》作出了高度评价，在通过《决定》的会议上他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并且说，“这次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陈云同志也指出：“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的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

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50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

之后，十三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样，就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从旧观念中解救出来，在干部和群众中达成了对于改革的实质和目标的共识。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刚才的谈话中提到“商品经济”，又提到“市场经济”，过去还有过“货币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提法，您能否就这几个名词的异同及其来龙去脉作一些解释？

吴敬琏：好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同一种经济类型所用的称呼。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首先分析了商品货币关系，他把商品货币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叫做“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或者叫做“货币经济”，而没有用过“商品经济”这个表达方式。“商品经济”是一个俄语词汇，苏联的著作一般都采用这种说法。由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从苏联介绍过来的，因而“商品经济”也成为我国经济学的通行说法。至于“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本世纪初才流行起来的说法。它的流行，与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有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抓住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核心问题——稀缺资源的配置，对市场经济如何通过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和自主企